

中国圣人文化论纲

刘刚 李冬君 著

中国文化三段论：神化，圣化，公民化。
圣人文化两核心：人民性和革命性。
儒家圣化两条路：圣王路线和圣王路线。
要走出圣人文化：文化个体性自觉。



中国圣人文化论纲

刘刚 李冬君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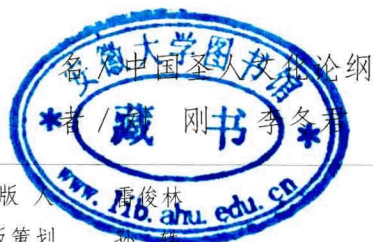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圣人文化论纲 / 刘刚, 李冬君著. -- 太原 :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440-4954-2

I. ①中… II. ①刘… ②李… III. ①孔丘 (前551~
前479) — 哲学思想 — 影响 — 中华文化 — 研究 IV.
①B222.2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7642号

书
作



出版人 唐俊林
出版策划 孙 敏
责任编辑 杨 文
复 审 张沛泓
终 审 刘立平
装帧设计 王春声 王耀斌 崔文娟
印装监制 郭 勋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472980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1340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60千字
印 数 1—5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4954-2
定 价 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21671。

前言：“圣化”之引论

一、问题之缘起与“圣化”之要旨

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必然要讨论孔子。讨论孔子，千头万绪，从何说起？是沿着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路径，从“礼”与“仁”等观念的辨析入手，然后对其整个思想体系作价值评判，还是走出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路径，把他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思想文化”领域，看其思想体系是怎样转化为中国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并以何种方式主导着中国文化的价值趋向？我们选择了后者。这不仅是因为后者在学术领域属于更高一级的范畴，需要更多的学术探讨和理论创新，更因为后者能为历史问题提供更加完整的解决方案，能给予现实以更为深刻的启示。

经由这一思路，我们对孔子进行了新的探讨，从而提出“圣化”的范畴。我们认为，“圣化”比“礼”与“仁”等概念能更为深入地把握中国文化的质，能更为清晰地展示中国文化之趋势。“圣化”并非儒家的专利，它是先秦诸子的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同。在这一共同的文化认同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是以法家为代表的“以王为圣”的圣化路线，一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以圣为王”的圣化路线。这两条路线在秦汉之际和西汉初期作殊死

之争，最终以独尊儒术和孔子圣化的完成得到解决。从表面看，解决采取了“定于一尊”的方式，而实际上观念的兼并是在学派的融合中完成的，“霸王道杂之”便是对这一融合过程的确切表述。

通过对“孔子圣化”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儒家的圣化路线怎样从边缘进入主流进而成为主导，怎样规范并决定着中国文化的质和文化的趋向。我们不仅从王权政治边际平衡的错综复杂的实际需要上，更从“理性的狡计”即思想运动的内在规律上，从儒家的现实选择即学派得以安身立命的本质和策略上，进行更加深入和更为全面的考察。这一考察所起的作用，不光是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开拓出新的学术领域，建立起儒学研究的新范式，它还为我们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理解，提供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基础，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转型提供历史的经验和依据。

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孔子一直居于中国文化的显学地位，讨论中国文化谁也绕不开孔子，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学术研究销声匿迹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孔子依然成为大批判的对象。在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孔子又作为传统的化身矗立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对他进行选择：是沿五四之路继续前进，还是回归孔子，复兴儒学？前进派发扬五四精神，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回归派则从儒学经典中，发掘自由与民主的传统。这两派文化认同一致，而文化策略迥异，一取五四精神，一取儒学传统。这两种取向，在学术上表现为两大流派，一是反思派，将孔子还原于历史；一是复兴派，要将儒学发扬光大。本书的立场属于反思派，通过对“孔子圣化”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将孔子还原为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把他放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理解，对其历史作用作客观的、求实的评价。然而这种历史化的处理方式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对“历史条件”如何看待和怎样理解的问题。是将“历史条件”理解为孔子生前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环境，抑或将其延伸至他死后的秦汉大一统，或是将其继续下延至秦汉以后

的各朝各代？我们没有对“历史条件”作这种以王朝为本位的历史分期式理解，而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将其定位为“圣化时期”。

因此，我们从孔子圣化入手，提出中国文化“三段论”——“神化”、“圣化”和“公民化”，圣化文化“两条路线”——圣王路线和王圣路线，“三种模式”——孔子“下学上达”、孟子“反身而诚”、荀子“化性起伪”，并揭示出圣化文化的两个核心理念——人民性和革命性，以及它们在秦汉之际是怎样推动着儒者革命，在汉初之时又如何继续在继续革命中实现儒术大一统，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化使一家之言上升为王权主义，使野人孔子成为王者万世之师。与此同时，我们还指出文化转型的关键在于“走出圣化”——以公民取代人民，以民主取代民本，以法治取代革命。简言之，就是中国文化自由化。

二、文化“三段论”与圣化“两核心”

我们认为，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化，就其文化形态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一是神化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以神道设教，率民事神，它集中在神话与历史交错的夏、商、周三代；二是圣化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从事神转向尊圣，从神道设教转向以民为本，从君权神授转向内圣外王，时间划分在三代以后民国以前；三是公民化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从君权转向民权，人民的具体身份从臣民转为公民，政治理念从民本转为民主，其阶段发轫于近代以至今。

我们对孔子的考察和评价，是将他置于圣化时期内作为历史人物进行反思，而非超越历史条件对他一如既往地作什么“万世师表”式的评价，这种评价与新的历史时期文化质的规定性格格不入。我们的立场是要走出圣化，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回眸那个圣化的孔子。作为历史人物，你仰之弥高也好，

叹为观止也好，他的使命毕竟已成历史。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重新感受一下古典时代的文化精神，体验一下文化传承中搏动的生命激情，与各种思想的幽灵作无拘束的对话，使我们当下的存在，在对先哲们的同情的了解中进入永恒的生命之旅，这无疑是一种最为奢侈和诱人的享受——让生命诗意地栖居于历史。当然我们也要注意那种单纯的发思古之幽情，一不留神就会再度萌生“六亿神州尽舜尧”式的憧憬，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莫名其妙地激活圣化的幽灵，使我们堕入历史的怪圈而再度沉沦，无论尊孔还是批孔都难以走出圣化的历史性宿命。

五四以来，各种各样的反传统的思潮和运动，虽然波澜壮阔，改变了文化的面貌，推动着历史的进程，但都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展。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在指出了目标和方向之后却迷失了路径，歧路亡羊的故事在自命不凡的新文化运动中同样发生。过分自信的新文化，无论其整理国故还是全盘西化，都不妨碍两个圣化的幽灵借尸还魂，它们以神圣的名义使新文化保持沉默，使各种反思的运动退避三舍。这两个幽灵是圣化的核心理念，一是民本主义，二是圣人革命，它们“好风凭借力”，在革命救国的口号中依然青云直上。新的文化还来不及区分民本主义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就被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革命洪流推向前去。进入新文化的民本主义革命，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得到新文化的认同。于是，我们的思想在这两个幽灵的诱惑下以最激进的方式堕入圣化的怪圈。当继续革命的口号响彻云霄之时，这两个徘徊的幽灵正如日中天；当反思也需要下地狱的勇气时，我们的思想就长期被禁锢在圣化的怪圈里裹足不前。

三、两个概念区分与政治文化定性

走出圣化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更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学人，不管自觉与否，都或多或少要承担这一使命。本书作为这项工程的基础性工作的一部分，它的任务不是全方位探讨如何走出圣化等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理论问题，而是为将来从事多方面的理论研究作一些必要的学术史的准备。

在这里我们先要区分两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一个是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里司空见惯的“圣人观”的概念，另一个是在近几年开始兴起的“圣化”概念。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圣人观”是对圣人的看法，具有面面观的性质，它是传统人性论的终极追求，被古典伦理学确立为人格范式、人生理想，在古代政治思想中，它又被赋予了与最高政治权威“王”合一的属性。而“圣化”的概念则不对人性进行品分，也不在政治思想中为圣人确立坐标，而是在文化的总体框架即天人古今关系中阐明圣人的主体性和主导作用，不断强调其核心理念民本主义和圣人革命的普世性功能，以及这一功能对于文化的价值取向的引导和评价作用，使被动的作为文化载体的个人，自觉地将其个体性消解在“人民”这一虚拟的普遍性中，从而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圣王合一的王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

因此，“圣化”首先是指一种文化质的规定性。当我们提出“文化”这一命题时，通常总是不假思索、不作任何分辨地将“文”和“化”两个字随便连在一起，其实“文化”是一个主谓结构，“文”是主语，“化”是谓语，以“体用”言之，则“文”为体，“化”为用。所谓“文化转型”，一般是指作为“文”的主语、主体的转换，而作为谓语的“化”的功能总是不变。中国文化转型中作为主语的“文”已经换了两次：第一次是以“圣”替换“神”，文化转型是从“神化”到“圣化”。“神化”是以“神”为文即

以“神明”为主体的文化，而“圣化”则是以“圣”为文即以“圣人”为主体的文化。第二次是以“公民”替换“圣人”，文化转型是从“圣化”到“公民化”，“公民化”是以“公民”为文即以“公民”为主体的文化。第二次转型就其语态而言仍处于“正在进行时”，“公民”作为文化的主体虽被确认但尚未确立。其次，是在文化的句式如何确立宾语，并使宾语达到对主语的完全认同，从而上升到主语的问题。例如在“神化”文化中，“率民以事神”，“民”就成了“神化”的宾语，“事神”就是宾语“民”对主语“神”的认同。但是，在“绝地天通”以后，“民”与“神”绝对二分，作为宾语的“民”不可能上升为主语“神”，因而有了圣人革命。在“圣化”文化中，“以民为本”，“民”也成了“化”的对象——宾语，在这一文化句式中，圣人作为主体，人民作为载体，圣人作为主导，人民作为基础，作为宾语的“民”除了向主语“圣人”认同，还可以向圣人转化，“人皆可以为尧舜”不仅透露出这种转化的消息，而且还对“民”提出了“自化”的要求。“自化”的对象是自我，化到“无我”时宾语就上升为主语。因此，在“圣化”的文化句式中，作为宾语的“民”处在“圣化”与“自化”的对立统一之中。

然而，当普遍的“自化”形成一种文化的自觉时，“圣化”与“自化”的潜在对立便显现出来。一旦历史机遇成熟，作为宾语的“民”的“自化”最终要回到对自我的肯定上来。这种对自我的认同，便以民主革命的方式，推动“圣化”向“公民化”转型，从而达到对民的本质的绝对肯定。在这种绝对肯定中，“民”从宾语状态解放出来，完全上升为主语。在“公民化”的文化句式中，“化”的对象不再是作为整体的“民”，而是作为个体的“我”，正是在个体“我”的自律中，实现文化个体性的自觉。

本书不对文化转型问题作全面的研究，而是把它当做一个可资参照的理论背景和可以借用的理论框架。本书着重考察在先秦诸子普遍的圣化思潮

中，孔子是怎样脱颖而出，从宾语上升为主语，从载体上升为主体，以及与孔子圣化有关的学术演进、学派兴衰及其政治沉浮，在时间上我们将它约定在春秋至秦汉大一统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圣化模式的成型期，也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由私学转变为官学，从一家之言上升为意识形态，以一介布衣而为万世师表的时期。此后这一圣化模式经历了唐宋之间三教合一的融合期，明清以来西学东渐的维新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又开始进入转型期。那些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们一只脚走出了圣化，另一只脚却留在圣化的门槛内，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从民本主义的情感里走出来，没有一个人敢独立反对以圣人革命的方式来开创历史的新局面。也就是说，这些文化英雄们的文化个体性仍处于转型之中。直到如今，政治文化从“圣化”向“公民化”的转型仍未完成，公民化的思想观念已经出现，公民化的历史趋势已经形成，而公民化作为一种文化却尚未成型。

本书的学术研究定位在“圣化时期”的成型期，以后将逐步进入融合期、维新时期乃至转型期的研究领域。本书除了坚持“反思”的思想立场，还遵循“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路径，并以“王权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定性为思想前提。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除了坚持思想史的研究传统，即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结合的方法，还着眼于“观念的考据学”，不仅对观念的结构作静态的功能性分析，还对观念的起源及其演进作动态的变异性描述，尽可能地将在历史的观念及其作用，置于具体的政治文化的背景中，使之凸显出来作为牵引时代及其历史事件的绳索和灵魂。它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不是让历史事件按先验理性的逻辑预设逐步展开；也不是分析的历史哲学，仅仅对历史的性质作知识论的诠释；而是反思的历史哲学，从文化的个体性出发去认识历史本身，并以个体性为基础来建立历史本体论。

四、“孔子再评价”与“王权主义”反思

对孔子及其儒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史的显学。顾颉刚先生在1927年发表的《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中，指出孔子生前及其死后命运的变迁，描述了孔子由君子而圣人，由圣人而教主，最终又复返君子的历程。作为君子的孔子是真实的孔子，他被圣化的思潮推到圣人的地位，又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被改造成教主。当圣化及其意识形态需求逐渐淡化时，他自然而然要回归其本来面目。如果说作为圣人的孔子是文化的象征，作为教主的孔子是意识形态的代表，那么作为君子的孔子则是个诲人不倦的教师和学者。在“打倒孔家店”中被打倒的孔子是作为圣人和教主的孔子，而非作为君子的孔子。作为君子的孔子，他的位置在中国学术史上，不在意识形态上。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作为君子的孔子也被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阶级属性，划分了阶级成分。他时而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以相当时髦的革命者的面目出现（以郭沫若等为代表）；时而又作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以声名狼藉的反革命的面孔出现（以杨荣国等为代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又被古为今用地与林彪捆在一起接受历史的审判。

“文化大革命”以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推动了学术上的思想解放，这一时期出了一系列孔子再评价的文章。这些文章或多或少受了大批判的影响，有的依然是从政治的夹缝里挤出来的，就其学术性而言还缺乏独立的品格，其倾向大都带有一些平反的意味，由于种种局限而言不尽意。其中庞朴的《孔子思想的再评价》较具代表性。该文1978年发表在《历史研究》第8期上，其特点是将孔子从大批判中解放出来，把他重新放到批判与继承的历史地位上作学术的评价。1978年10月21日~30日在山东大学召开的全国文科理论上，蔡尚思、孙叔平、张岂之、庞朴等纷纷著文，由山东大学历史系辑成

《孔子及孔子思想再评价》一书，于1980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可谓这一时期对孔子研究的代表。

在孔子再评价中真正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工作，是李泽厚于198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上发表的《孔子再评价》一文。该文在国内学术界首次提出孔子“仁学结构”四要素及其实践理性特征，形成汉民族具有普世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它源于氏族社会的民主遗风，表现着原始的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的追求。他指出，应该把孔子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内进行考察，把孔子放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交融会合的前景上来评价。该文当时影响甚大，那些充满激情的思想，那些富于美感的理念，那些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范式，曾激动并启迪过许多青年学者的心灵。但是，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和对历史反思的更加深入，该文的局限性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是“旧瓶装新酒”的局限，新的思想、理念被置入旧的理论背景和学术框架内，很难再激发新的思想，产生新的理念；二是思想的原创性基础薄弱，循着他的思路学者很难把研究往前推进，因此，青年学者们便回过头来对他的思路进行批判和反思，“孔子再评价”时期至此已告终结。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文学界兴起文化热，文化热与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相辅而行，形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次新的文化运动和社会思潮。作为中国文化轴心期的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受到“文化热”的高度关注，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评价纷至沓来，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庞朴继其《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之后，又著《儒家辩证法研究》一书，该书于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提出，道家用“弱”、法家用“强”、儒家用“中”，而用“中”则是对立统一，其特点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三分法”，“中”不仅连接着对立的双方，而且坚持着自立的原则自成一统，成为与对立的双方鼎足而立的“三”。这是国内学界从思维方式上对孔子及

其儒学进行研究的一部力作，其价值不仅在思想史研究的学理性方面，更在于政治文化的应用性方面，它实际上为当时政治方向上的“左”与“右”的争执与选择，提供了一个新的用“中”的解决方案。然而当局者迷，其苦心孤诣难免付之东流。一年以后，匡亚明编著的《孔子评传》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共十章，对孔子推崇备至，名曰评孔，实则尊孔。作者将孔子从君子的地位上提升起来，使之重新成为文化象征和学者偶像，开了20世纪80年代圣化孔子的先河，为新儒学回归大陆学界作了学术先导。

在文化热中，作为主流思潮的是对传统的批判和反思，史学界的代表人物是刘泽华。1987年10月，刘泽华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以独创性和批判性而一鸣惊人，学术界和读书界对该书作了高度评价。该书在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作整体性反思的基础上，对孔子及儒家政治思想作了深刻的理性批判，并将其纳入王权主义的范畴。虽然该书涉及的所有问题在学术上都有其深刻的原创性，但是该书最重要的贡献却是王权主义这一学术范畴的提出和确立。也许著者本人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更谈不上什么能动的策划和设计。书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与王权主义》，人文思想比政治思想的外延要宽，在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人文思想并将二者打通，著者无意间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从1988年开始，刘泽华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课，并跨学科组织研究力量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深入探讨。

1989年，刘泽华和他的学生葛荃、刘刚合写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导论》一文，该文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上，这是国内第一篇系统提出并确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文章。该文从政治价值系统、政治社会化、政治一体化三方面，指出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但同时又感到用王权主义全面概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尚有一定的

局限性，例如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虽然与王权主义互动互补，却不能完全纳入王权主义；主张“从道不从君”的主体人格，也不能一律视为王权主义的补充等。它们需要有一个更高的范畴来概括这并立的双方，这更高的范畴便是圣化。其实刘泽华早在《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与王权主义》一文中就提出过圣化，但它只是作为一个提法，并未作为一个更高的范畴提出来。

1990年，刘泽华又与他的学生李冬君合作撰写了《宋代理学圣人无我及其向圣王专制的转化》一文。该文提出并解决了圣化与王权主义的关系问题，阐明了圣人如何从“内圣”的“无我”——自我专制，向“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外王”的社会专制转化的，强调圣化的本质依然是王权主义，从而将《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与王权主义》一文中的提法，系统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与当时风头十足的新儒学的观点表明了截然相反的立场：无我的内圣只能开出专制的外王。

对圣化问题做全面研究和整体性思考的是刘刚的《圣化：道、王、神一体化》，该文收入1991年10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一书，其价值有三：一是对圣化的起源及其演进作了充分的描述；二是提出了一个关于圣化即道、王、神一体化的结构功能模型；三是以圣化作为中国文化的质的规定性，指出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关键是要走出圣化。与刘刚对圣化作整体性把握的同时，李冬君则从个案研究入手，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圣化作了专门探讨。作为探讨成果之一的《儒家分化与孔子圣化》一文，发表在《南开学报》1998年第3期上，该文首次将“儒家分化”这一学术史问题，与“孔子圣化”、儒术独尊等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将这些新的观点作系统性的发展，就形成本书。

目 录

前言：“圣化”之引论 001

- 一、问题之缘起与“圣化”之要旨 001
- 二、文化“三段论”与圣化“两核心” 003
- 三、两个概念区分与政治文化定性 005
- 四、“孔子再评价”与“王权主义”反思 008

第一章 从“神化”到“圣化” 001

- 一、殷周之际的革命 001
 - 1. 殷人的“神化帝王”观 001
 - [1] 天、帝、王统一性之滥觞 001
 - [2] “民”的意义检索及其引申 006
 - 2. 周人的“圣化民主”观 009
 - [1] “圣化”革命之缘起 009
 - [2] 周人“圣化”之端倪 011
 - [3] “德”在周文化中的意义 013
- 二、春秋圣化大趋势 016

1. 圣化之一：从民心到人性 017
2. 圣化之二：从“有德”到“有道” 022
3. 圣化之三：从礼仪到礼义 026
4. 圣化之四：孔子之道“一以贯之” 031

第二章 儒家圣化模式与孔子圣化 039

一、先秦儒家圣化模式 039

1. 孔子圣化模式——“下学上达” 039
2. 孟子圣化模式——“反身而诚” 042
3. 荀子圣化模式——“化性起伪” 047

二、儒家分化与孔子圣化 052

1. 先秦儒家三期演变与圣化谱系的形成 052
2. 王权下的《论语》结集和王化的孔子形象 060

三、先秦诸子论孔子与孔子的圣化 066

1. 孔子入百家：先秦学术分化及其演进 066

[1] 王官之学与诸子之学 066

[2] 争鸣与争霸：子学王官化 067

2. 走向外王的孔子：诸子的批判与认同 068

[1] 《墨子》论孔子：道德批判与理性批判 068

[2] 《庄子》论孔子：“知命”与“由命”者 070

[3] 《韩非子》论孔子：法制与人伦的悖论 071

[4] 《吕氏春秋》论孔子：孔子面面观 074

3. 孔子圣化：批判的解构与认同的转化 078

[1] 批判的解构 078

[2] 认同的转化 079

第三章 先秦诸子圣化观综述 081

一、先秦文化转型与诸子造圣运动 081

1. “圣”的本义及其在文化转型中的演变 081
2. 诸子对圣人的设计与战国圣化之趋势 087

二、圣化：道、王、神一体化 094

1. “道化”——圣道同体 094

- [1] 圣人的自我操作 094
- [2] 圣人的人际操作 098
- [3] 圣人的形名操作 102

2. “王化”——圣王合一 106

- [1] “王化”之一：法自然 106
- [2] “王化”之二：因人性 108
- [3] “王化”之三：辨名实 110
- [4] “王化”之四：行教化 111
- [5] “王化”之五：尚专制 112
- [6] “王化”之六：一天下 114

3. “神化”——神圣一体 116

第四章 秦汉儒者的外王运动 123

一、博士儒的“王圣”运动 124

1. 儒者的向往与皇帝的抱负 124
2. 儒门“王圣”运动始末 128
 - [1] 博士儒的兴起 128
 - [2] “王圣”——博士儒的政治文化 132
 - [3] 儒法斗争与王圣运动的终结 142